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杜甫诗选

山东大学中文系
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杜甫诗选

山东大学中文系

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杜 甫 诗 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244,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2\frac{1}{2}$ 插 页 4

1980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80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01—100,000

书 号 10019 · 2984

定 价 1.00 元

前 言

唐帝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的封建王朝。在它建立后的百余年间，由于政治上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措施，社会安定；经济上实行均田制，使广大农村得以“男耕女织不相失”，因而在公元八世纪初，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文化方面，都呈现了一种历史上稀有的繁荣景象。然而，在八世纪中叶发生的一场持续近八年之久的战争，一下子打破了那种繁荣景象，唐王朝从此陷入了内外交困，混乱衰败，再也无法摆脱的困难境遇了。

大诗人杜甫就生活于唐王朝由盛到衰急速变化的历史时期。

—

杜甫字子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杜审言，在武则天时代做过膳部员外郎，是个著名的诗人。杜甫颇引以为荣，说“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这对他一生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无疑是一条较为重要的纽带。父亲杜闲，做过兖州司马、奉天(陕西乾县)县令。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社会上享

有一定的特权：不纳租税，不服兵役，有资格结交权贵人物和社会名流。这就使得杜甫在青少年时期就曾出入岐王李范等贵族官僚的宅第，看过名伎公孙大娘的舞蹈，听过名歌者李龟年的演唱，并度过了“读书破万卷”的书斋生活，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养。而后又南游吴越，北游齐赵，结识了著名诗人李白、高适和文章名家李邕等人，赢得一片友好的赞誉。当时杜甫少年气盛，自视甚高，以为功名唾手可得，正如他后来自己讲的那样：“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但事实却未能象他自己想象的那样顺利、美好。

杜甫曾经在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没有及第。为了进入仕途，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他在玄宗天宝五年（746）到了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在那里待了整整十个年头。第二次应“制举”，又由于权相李林甫作梗，应试的人全部落第。考试的失败，迫使他另寻途径，一面向权贵人物投诗，乞求荐举，一面曾三次向皇帝献赋，并上表陈情，恳求怜悯任用。天宝十年（751）献《三大礼赋》，虽曾受到玄宗的注目，命待制集贤院，但还是拖到了天宝十四年（755），才获得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掌管兵甲器仗及门禁锁钥）的小官职。仕途上的挫折，“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境遇，“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的生活困苦，把他折磨得老气横秋，青年时代的那种凌人的盛气，逐渐地被剥蚀净尽，而代之以对现实社会的执着的注目和深邃的思考。

长安是唐王朝的心脏，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就在杜甫困守长安的时候，社会大动乱的种种征兆，已在这里的政治风雨

表上显示出来了。玄宗李隆基日益骄奢淫逸，耽于声色，挥霍无度，提拔信用投合己意的善于投机钻营的野心分子，造成了朝内权贵的骄侈，内外官僚对劳动人民加重压榨。玄宗好大喜功，对边疆地区滥施武力，毁掉了国内各民族间比较融和的关系，助长了边将的邀功心理，野心膨胀，恃武傲上，跋扈不驯。大量地征调士卒戍边，也使得中原地区的生产严重地遭到了破坏。社会的多种矛盾尖锐化，危机日益暴露出来了。政治上失意，生活上陷于困顿，使得杜甫比一般人更为清醒地看出玄宗朝政的腐败；朝政的腐败，社会危机的加深，又更加激发了他对唐王朝命运的关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的理想，也变得更为充实，并迫切地要付诸实践。这样，在他头脑中，个人怀才不遇的牢骚逐渐注入了社会的、政治的内容，变为对玄宗朝政腐败、政令失宜的不满。所以，他要进行讽喻和抨击，先后创作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光辉诗篇。长安十年，是他失意的十年，也是他的世界观发生显著变化、在诗歌创作上逐渐走上一条坚实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十年。

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在范阳发动了叛乱，战火遍及黄河南北，北中国的人民遭到了巨大的灾难。第二年，安史叛军就攻陷长安，玄宗仓惶逃往四川。杜甫经历了逃难、陷贼种种苦难，既没有逃往叛军所不及的南方，也没有背离朝廷，屈节事敌，而是伺机摆脱了叛军的监视，投奔了驻凤翔的上年即位的肃宗李亨，表现了支持平叛的正确立场。到凤翔后，杜甫被任为左拾遗，做了侍从皇帝的谏官，似乎可以“致君尧舜”了。然

而，为时不久就由营救被罢相的房琯，批评肃宗措置失宜，而触怒肃宗，几乎问罪，被放还鄜州（今陕西富县）探亲。既已不为肃宗所喜，所以在他随朝廷回到长安后只几个月，便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这年即乾元元年（758）岁末，他由华州回洛阳理事，不久遇上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会战九节度使兵溃败，安史叛军再度猖獗，洛阳一带面临再度失陷的危机，他又在沿途兵荒马乱、气氛紧张的情况下，匆匆折回华州任所。在战争爆发后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杜甫多次奔走于战事激烈的两京地区，广泛地目睹了战争的大量杀伤和对城乡的严重破坏，自身饱受忧患，也亲身体察到了广大人民所遭受的惨重苦难。他曾为亲属的流离困苦而悲哀，为都城的陷落和遭劫焚而痛心，更为士卒的死伤、百姓被强征去打仗、广大农村一片荒凉而哀叹不已，先后创作出了《春望》、《北征》、《羌村》和“三吏”“三别”等凝聚着他自己的和广大人民的血泪的诗篇。战乱推动着杜甫接近了人民，人民的苦难有力地影响着杜甫的思想，使他的诗歌创作更加具有了难能可贵的人民性的素质。

乾元二年（759）秋，因关中大饥，杜甫舍弃了华州的官职，前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后经同谷（今甘肃成县）进入四川。他的生命的最后十年，主要是过着漂泊依人的生活。中间虽曾一度入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严武的幕府，以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官衔充任节度参谋，但由于不能有所作为，半年时间就辞退了。后来滞留夔州（今四川奉节）期间曾为东屯主守，不过管着一百顷公田的收种，算不上什么官职。长时期的依人流

寓，曾不断受到严武、高适、柏茂琳等达官友人的资助，生活上尚能免于饥寒。特别是在成都期间，他在浣花溪畔营造了有水槛、药栏、竹林的草堂，得以闲居江村，诗酒自娱。但是，为时并不长，就总的情况说，还是困苦多于安适。更何况去国离乡，政治失意，心情何以能真正泰然。特别是国家多难，安史之乱好不容易平定，跟踪而来的又有吐蕃不断侵扰陇东地区，乃至一度占领长安，四川也不断发生地方军阀的叛乱，百姓受到的灾难，包括征戍、租赋的加重压榨，也很惨重，这一切都时时牵动着、撞击着他的心弦。闻见广，感受多，诗篇随着他的足迹所至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特别是滞留夔州的两年间，感时伤世，缅怀旧事，追怀故交，诗的数量就更多，形式和风格也更多样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登岳阳楼》等，都是这个时期的名篇。

诗人杜甫，一生空抱“致君尧舜”的理想，却始终没有如愿以偿。他年轻时自视甚高，以古代的贤臣契、稷自期，结果却是半生潦倒，饱经患难，长期处在逃难、漂流的境遇里，最后连返回故乡的愿望都没有实现，就在代宗大历五年（770）病卒于漂流在湖南湘江中的那条数年与他相依为命的破船上。就个人的身世说，他是非常不幸的。然而，他这饱经患难的一生，与那个历史大转折时期的治乱盛衰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诗人在安史之乱中蒙难受害，缩小了他与遭受同一祸患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他始终执着地关注着时政、战局和人民的生活状况，无论是忧伤，还是欢乐，都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息息相通。这正是促使他创作出那么多优秀诗篇，从而成为垂名后世的伟大诗人的重要契机。历史本身充满着辩证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杜甫这不幸的一生反倒变作了幸事，艰难玉成了我们的诗人。

二

杜甫一生借诗言志抒怀，勤于惨淡经营，直到临终时还在伏枕挥笔，创作了大量的诗篇，仅流传下来的就多达一千四百余首诗。这数量上颇为可观的诗篇，无论是叙事记行的，还是抒发情怀的，大都是伤时忧国，缘事而发的，有着丰富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可以说，举凡当时的朝政大事，安史之乱中的一些重大战役，唐王朝与边疆地区几个民族的关系的变化，乱前繁荣和乱后民生凋敝的社会景象，以及乱离中人民的苦难境况，在杜甫诗中大都有一定的反映。由于诗人观察既广，阅历又深，常常触及到时代的症结所在，而且真实描写，并不掩饰，所以我们通过一部杜甫诗，可以清楚地看出唐王朝由盛到衰变化的历史轨迹，其中的种种表现，及其深刻的内在原因。诚如浦起龙所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所以，自唐代起，杜甫诗便获得了“诗史”的美称，并且一直为后世评论者所公认。

号称“诗史”的一部杜甫诗，固然如前人所言，可以作为正史的佐证，可以补正史所未载，由于诗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和现

象甚多，表现得非常真实，又多有正史所不及记载处，常常令我们惊叹不已，这方面的意义是不应忽视和抹煞的。杜诗可以丰富和深化对唐代社会的认识，可以纠正正史的不足和失实处，使我们从中获得更多有益的历史启示。但是，称作“诗史”，并不意味着它是有韵文字的历史实录，只是表明它具有这样一种突出的艺术品质和特征。杜甫也是遵循着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饱和着激情和爱憎，来反映现实的。所以，他的诗作也象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不仅反映了一定的客观现实内容，而且表现着诗人对现实的思索和理解，凝聚着炽热的感情，其意义不止于认识唐代历史，而是更为深远的。

杜甫诗歌的进步思想内容之一，是揭露和讽刺统治阶级的骄奢腐朽。杜甫一生关心国事，勇于仗义执言，看到统治阶级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丑恶行径，都愤然为诗，进行揭发、讽刺和抨击。如《丽人行》非常艺术而辛辣的讽刺贵戚权臣杨国忠兄妹的骄横奢侈、荒淫无耻。《冬狩行》讽刺东川留后章彝置国事君难于不顾，在吐蕃攻占长安、代宗出奔之际，却大张旗鼓地打猎取乐，耀武扬威。《三绝句》暴露四川地方军阀相互争权夺利，纵兵行凶：“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暴露以抗拒吐蕃为名的“殿前兵马”，如同被驱东来抢掠、侵扰的吐蕃兵一样地奸淫烧杀，残害人民：“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这类批判讽刺性的诗篇，大都是写在被批判讽刺者掌握权势、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时候。《丽人行》如此，《冬狩行》还正是写在诗人逃难东川，暂栖章彝治下、并受其款待的时候。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不少诗篇是针对皇帝和

直接指向皇帝的。无论是玄宗、肃宗、代宗，杜甫在诗中都有所讥刺。《兵车行》是就玄宗信用鲜于仲通用兵南诏，结果惨败，死伤数万，复大肆征兵一事而发，讽刺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严重造成人民大量伤亡，农田荒芜。《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更径直地把讽刺的矛头指向在骊山避寒、寻欢作乐、挥霍无度的玄宗，诗中愤慨地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尖锐地揭示出皇帝为首的贵族豪门奢华淫乐，是通过残酷地压榨掠夺劳动人民的血汗来维持的，是凝结着无数人民的血泪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岂只是贫富两种生活的客观对照，而是对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压榨掠夺劳动人民罪行的有力揭露。当杜甫看到皇帝昏庸，宠信宦官，弄得国家形势愈益不可收拾时，在《忆昔二首》之一中，不仅痛骂宦官李辅国“关中小儿坏纪纲”，还挖苦到肃宗只知取悦张良娣，说“张后不乐上为忙”，可谓十分辛辣。杜甫虽然摆脱不掉忠君思想，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皇帝身上，如他所说“兵革自久远，兴衰看帝王”，期望皇帝“行俭德”，减轻对百姓的压榨，但敢于揭露和讥讽皇帝的罪过，并揭开他们压榨人民的真象，毕竟表现出了卓越的胆识，这些诗无疑是包含了民主性的精华。

杜甫诗歌的进步思想内容的另一个突出方面，是反映了繁重赋役和战乱给广大人民造成的苦难境遇。杜甫是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人。在古代众多的诗人中，很难找到几个象杜甫这样对劳苦人民投予深切的关注和同情，也很难找到几部诗集象一部杜诗这样多、这样真切地反映着人

民的生活、人民的辛酸血泪。《前出塞》写被征去戍边的士卒，从与家人诀别和沿途的痛苦，到他在军营中经受的折磨、欺侮，非常真实深刻，体贴入微。著名的“三吏”“三别”，通过新婚的丈夫、“子孙阵亡尽”的老翁、不成年的“中男”和“二男新战死”的老妇这几种人被强征、强抓去打仗的几个情景悲惨的画面，高度概括地反映出战乱和兵役的极端残酷，反映出人民的苦难达到了无比的深重，男女老幼都无法幸存。“何以为蒸黎？”可以说是表达了广大人民惨痛之极又悲愤之极的呼声。在杜甫诗中，不只有战争的摧残、兵役的迫害，还有繁重的赋役对人民的残酷压榨：“时危赋敛频”，“索钱多门户”，劳动人民一年辛苦劳动的收获被剥夺净尽，还要卖儿鬻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宴行》等许多诗篇，反映了四川、湖南各地人民不堪承受繁重赋税压榨的痛苦，并且发出了“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的呼吁，表达了对那些营私肥己、横征暴敛的官吏的忿恨；“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蠹贼！”此外，如《负薪行》描绘夔州劳动妇女的困苦艰辛；《又呈吴郎》写对被赋税压榨得“贫到骨”的老妇来自己庭院打枣的体谅：“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驱竖子摘苍耳》诗中念及“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粃窄”等等，都透过诗人的感受和情怀，反映了人民的疾苦。虽然杜甫只是期望平息战乱，官吏清白，轻徭薄税，有时还劝谕百姓去“死王命”，“慎勿远奋飞”，但诗中反映了他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特别是真实地反映了统治阶级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压榨和人民的苦难境遇，是有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和进步意义的。

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谴责分裂割据，是杜甫诗歌的进步思想内容的又一重要方面。唐前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国内各民族的关系比较融洽，汉族和边疆各族在经济和文化上频繁往来，对各族的历史都起了促进作用。从新、旧两种唐书的《地理志》和《食货志》关于方域和边区“互市”的记载，可以看出那种统一和团结的景象。杜甫的《昔游》等诗中就追忆到：“是时仓廩实，洞达寰宇开”；“八方开寿域，一气转洪钧”；“崆峒西极过昆仑，驼马由来拥国门”，字里行间流露着对那种“六合一家”、繁荣昌盛景象的向往。而更多的诗，如《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和《遣遇》等，是讽刺和抨击玄宗恣意用兵边疆，乃至远征西域诸国的黷武政策，损害了国计民生，也破坏了民族和睦友好关系；讽刺安禄山之流贪功邀赏，制造民族纠纷，发动叛乱，使国家出现分裂的危机。在有关国内民族纠纷的诗中，表现了杜甫难能可贵的清醒、明智。譬如，《西山三首》中批判了玄宗派兵攻击吐蕃，引起不和：“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而对于吐蕃侵扰陇东、攻占蜀西北的松、维、保三州，则坚决主张抗击，甚至发出了悲愤的壮语：“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另外，如《草堂》揭发徐知道勾结羌兵叛乱，成都一带大小军阀混战中惨不忍言的屠杀真相，《白马》等写臧玠据潭州（今湖南长沙）叛乱的情况，也都反映了反对破坏国家安定和反对残害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还渗透在记行写景的诗中。如《剑门》，先描绘剑阁险要，“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而后便写担心重现历史上争霸割据的分裂局面：“吾

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可以看出作者忧国胸怀的深沉。

杜甫诗歌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除上面三类直接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之外，还有一些描绘自然景物、抒写亲朋情谊和个人生活性情的作品。《望岳》写泰山雄伟壮观，令人心旷神怡。《夔州歌十绝句》写夔州一带山川形势、风土民情，形象地勾勒了祖国一角富有特色的风貌。其一：“赤甲白盐俱刺天，阆阆缭绕接山颠。枫林橘树丹青合，复道重楼锦绣悬。”景色如画，令人向往。这些诗表现了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春夜喜雨》刻画初春细雨的美妙：“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如温情脉脉；用美丽的联想写喜悦心情：“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物我两得，生意盎然。《漫兴绝句九首》之一写春到人间，鸟语花开：“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这类诗又反映了对美好的大自然的热爱。一些思亲怀友的诗，如《月夜》、《梦李白二首》等，表现了对亲朋的关切，真挚深沉。杜甫诗中不少咏叹个人困苦和老病的作品，无不寄寓着时代的悲哀，可贵的是中间往往推己及人，联想到饥寒中的人民，而且往往在悲哀中又显现出乐观。《江汉》写个人老病漂泊，境遇如“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而心情并不低沉，还感到尚可有所为：“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这许多诗表现了一种率真质朴、积极乐观、高尚无私的性情，对后人可起到审美教育的作用。

杜甫是封建时代的诗人，他的作品中自然不能不带有时

代和阶级造成的缺陷。他曾把忠君这种封建道德比喻为生物的本性，说“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诗中也流露着一定的功名心和门阀观念，同情人民疾苦却不同意人民造反。但是，对这些思想应当就杜甫的实际表现和诗的全部内容，加以历史地评论，而不应从抽象的观念出发。对杜甫诗歌中的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是应作科学的批判的。但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是，他诗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反映了历史的许多本质的方面，并且以难能可贵的清醒、明智，表达了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几乎难以超越的正确思想和意见，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到许多的思想教益，得到许多的历史启示；其中带有的缺陷并不是多了，而是比他同时代的一般诗人更少。

三

杜甫诗歌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并对我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杜甫的诗歌诸体兼备，运用了当时的一切诗体，而且又不受旧体裁和传统写法的束缚，在许多方面有所创新，独辟蹊径，因而一部杜诗就显得琳琅满目，丰富多采。然而在体裁、写法和风格的多样化中，又毕竟有其主导的、基本的艺术特征，这就是诗歌创作中的高度现实主义精神。

杜甫诗歌创作中的高度现实主义的表现之一，是前人曾指出的“以时事入诗”，也就是用诗歌反映当前的现实，特别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情。以前的诗人反映现实生活，较

少直接写政治上的大事，歌咏时事往往借用汉乐府旧题，甚而把所歌咏的时事镕铸于古代诗歌的躯壳里，虽然也有过些现实意义颇强的优秀作品，但多数与现实是有隔膜的。“以时事入诗”，严格地说并不始于杜甫，然而，他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的“缘事而发”的精神，取材于现实，特别是有关国家政治的大事，径直描写，或褒或贬，并不讳饰，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倚傍古诗，摆脱了以往“沿袭古题”的路子，创作出了《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以及“三吏”“三别”一类全新的诗篇。这种创作，有开辟意义，对后来诗歌创作有积极的影响。从中唐诗人白居易、元稹的“新题乐府”，直到晚清诗人黄遵宪的《台湾行》、《哀旅顺》等，一千年来这类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都是沿袭着杜甫开辟的路子。

杜甫“以时事入诗”，并不限于那些专咏时事的作品，而且还把时事注入记行咏怀的作品中。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题作“咏怀”，实际上既有言志抒情，也有记行叙事，写了个人的政治抱负和生活遭遇，也揭露了皇帝和权贵的淫乐，并进行了评讥，抒发个人的情怀与反映时事是紧密地结合起来镕铸于一炉的。另一名篇《北征》，也是这样把由凤翔北去探亲的缘由、沿途的战后景象、家人团聚的情景、京畿一带战争的形势，以及诗人对形势的看法和希望，都组织在一个艺术整体里。还有一类写景兼抒情的律诗，也多联系着时事。如《登楼》写登高所感，在抒情中透露出吐蕃攻占长安和攻陷松、维、保三州的事情：“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盗寇莫相侵！”《秋兴八首》是融化往事于当前的感慨中，从眼前景物兴起，以

追忆往事为主要内容，最后落在兴衰之感上，既是诗人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的自述，同时也有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动态的写照。所以杜甫诗歌，无论是记行或咏怀抒情之作，都包含了丰富的现实内容，有强烈的现实性，如前人所说，读其诗，可知其人、论其世。这也是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发展了现实主义的一个方面。

在诗歌中，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真切地描摹人物的形态、心理，是杜甫诗歌创作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对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一个发展。诗歌创作中，比兴自然是重要方法，杜甫诗中也用比兴，而且用得很灵活。但他的多数诗，就整个诗的创作看，不是用比兴的方法，而是基本上用赋的方法，赋中兼有比兴。特别是叙事诗，或着重叙事的诗，真实的描写是主要的。如《丽人行》主要是描写游曲江的虢国夫人的华丽服饰、丰美饮饌，杨国忠的骄横姿态和不避男女之嫌的行径，无一贬词，而杨氏兄妹奢侈荒淫，跃然纸上。“三吏”“三别”，基本上是通过具体描写事件或场面、人物的对白或独白，来表现主题。如《无家别》通过一个再次被征服役的独身汉的自语，有层次地写出了他败阵归来的行踪，村中凄惨荒凉的景象，打算暂且留下来而不可得的命运，也委婉地写出了他千曲百折的痛苦心情。《石壕吏》是用近于白描的手法，写出了一幕老妇被抓兵的悲剧，诗人几乎完全不用比兴，不特别表示意见和感情，而是把感情渗透在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写中，让诗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感染力，从所描写的人物动态、语言和心理中自然流露出来。